

熊诗平 徐 边 主编

【第四辑】

经济学家之路

JINGJIXUEJIA ZHILU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家之路

第四辑

熊诗平 徐 边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之路(第四辑)/熊诗平,徐边主编.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11

ISBN 7-81098-238-9/F · 209

I. 经… II. ①熊…②徐… III. 经济学家-人物研究-中国
IV. K825.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0494 号

特约编辑 徐永禄
封面设计 未 名

JINGJIXUEJIA ZHI LU

经济学家之路
(第四辑)

熊诗平 徐 边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上海浦东北联装订厂装订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14 印张 326 千字

印数: 0 001—2 000 定价: 30.00 元

编者的话

今天,《经济学家之路》第四辑正式出版并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在听取了读者和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后,收入本辑的是有关十四位经济学家成长经历和学术贡献的作品。其中十位是国内的著名经济学家,他们是(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叶世昌、陈豹隐、谷书堂、周炳林、周宪文、项启源、洪远朋、褚葆一、蒋自强、蒋家俊。其中四位是国外的著名经济学家,他们是(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前苏联的布哈林、美国的加尔布雷思、英国的李嘉图、德国的李斯特。

在国内十位经济学家中,有的是“五·四”运动健将、民主与科学的代表者和实践者,有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的是著作等身、三千万字译著的杰出的经济学家,有的是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是中国最早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教学开拓者的娃娃教授,有

的是重新解读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有的是经济规律系统论研究的开拓者,有的是《资本论》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学者,有的是将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史融为一体的《经济思想通史》的策划者兼撰写者,有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探索者。

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果,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经过艰辛探索所取得的理论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既是学者又是爱国主义者。他们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 and 勇于奉献的精神,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历经沧桑,业绩彪炳,厥功甚伟。这种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激励着千千万万的青年奋发努力,为祖国的美好明天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工作。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根据上述精神,在继续组织编写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经历和学术贡献的同时,从本辑开始,有选择地组织编写国外经济学家的成长经历和学术贡献,不断丰富和开拓《经济学家之路》的新内容,不断增强本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如,前苏联经济学家布哈林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而且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将革命实践和理论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列宁多次赞扬道：“布哈林是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过渡时期经济学》、《达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等重要著作中的卓越理论观点，以及独特的经济学方法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又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是新制度主义的代表者，相对正确地判断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讨论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重的经济权力——公司霸权，系统分析了公司内部组织形式与公司霸权的关系。他认为进步的技术体系推动保守的制度体系进行制度调整是社会进步的实现条件，等等。这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正确处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有启迪作用。

再如，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名代表和完成者。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但是，自从亚当·斯密提出多种价值理论以来，在数百年中，劳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价值论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我国前两年关于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要素价值论的大争论就是典型一例。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在对权威的挑战中，坚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反对亚当·斯密其他的决定价值原则；在价值决定上，批判科学王子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马克思赞扬说：“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价值

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今天,我们学习李嘉图理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经济史上都出现过后发国家赶上和超过先发国家的典型实例。比如,英国曾经赶超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世界强国,而后来居上的德国和美国又超过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追赶了上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经济强国;同时,在发展中国家中又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国。后发国家为什么能赶超先发国家呢?从经济思想史上讲,可以从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创始的历史学派经济学中找到答案。历史学派起源于德国,但它引发的后发经济学思潮经久不衰,先后影响到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特别是在美国产生和发展了制度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并产生了发展经济学。这是因为历史学派经济学重视经济发展,重视国家民族生产力的保护、培育和发展,重视生产要素的培育和合理组合,重视国家的作用,以及制度更新和民主法制建设。这些都被为谋求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后发国家所借鉴和效法,从而形成巨大的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所以,发展经济学和后发经济学的兴起,可以说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坚持“走自

己的道路”，《经济学家之路》将遵照这一指导思想，不断丰富和拓展新的内容，不断增强本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经济学家之路》第一、二、三辑出版以来，我们收到不少读者、作者和专家学者的来信、来电和来稿，给予我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其中有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胡代光、吴易风、张友仁、朱伯康、陈其人以及程恩富等。他们经常与我们保持联系，帮助策划选题、推荐作者，并撰写重点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学术贡献，从而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年高 97 岁的朱伯康教授，花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中外三位经济学家鲜为人知的特殊经历和故事。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将继续努力，不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

编 者

2004 年 7 月

目 录

我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金融史研究生涯 … 叶世昌/1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豹隐 …………… 常裕如/17	
辛勤耕耘 潜心求索	
——谷书堂学术生涯五十五年…………… 逸琴/45	
周炳琳教授的一生 …………… 张友仁/77	
非常开明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周宪文教授传略	
…………… 朱伯康/124	
在坎坷中奋进 在奋进中沉思	
——我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四十五年回眸 …………… 项启源/142	
洪远朋教授的治学之路…………… 余 波/172	
褚葆一教授传略 …………… 朱伯康/194	

走向经济思想史研究之路

——记我的学习、工作与学术活动…………… 蒋自强/213

与时俱进 上下求索

——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
…………… 蒋家俊/249

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布哈林独特的经济学方法论…………… 陈其人/281

反正统经济学家

——记新制度主义代表加尔布雷思…………… 张 林/332

从别的行星上掉下来的经济学大师

——李嘉图经济理论的精髓和迷误…………… 陈其人/362

后发经济学思潮的兴起

——李斯特创始的历史学派经济发展之路…………… 朱伯康/405

我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金融史 研究生涯

◎ 叶世昌



一、我的兴趣与研究方向

我于1929年出生于浙江省黄岩县路桥镇(今台州市路桥区)。1947年春,毕业于黄岩县立中学(今黄岩中学)高中部。同年夏考入复旦大学银行学系。在大学学习期间,正值新中国诞生的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一直处于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在读高中时,老师管昕石先生常在课堂中讲解政治形势,宣传革命思想,我亦受到影响,所以进入大学后,就对学生运动抱着支持和参与的态度。解放初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团支部的领导工作。

1951年7月毕业,留校任银行专修科助教。1952年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商学院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我成为上海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的教师。1953年夏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生。学满一年以后,因病休学,仍回到上海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

1954年,彭信威教授出版了《中国货币史》(当时由群联出版社出版,后经两次增补,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两版)。我在中学时看了许多小说,有些是中国历史小说,养成了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看到彭教授的《中国货币史》后,感到这可以成为我的一个研究方向。在我负责系资料室工作期间,财政信贷系买到了一批中国历代货币实物,系领导决定由我负责筹备展出。我以群联版《中国货币史》为依据,为各种钱币配写了详细说明。这一中国历代货币展览在1956年的上海财经学院校庆中展出,受到了各方来宾的好评。

1958年下放上海市宝山县炮台湾劳动锻炼,1960年调回。这时原上海财经学院已撤销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不久成立新的上海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改名为财政金融系,我在财政金融系任教。

二、重新解读中国经济思想史

1959年,由巫宝三教授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经济资

料选辑(1840—1864)》一书出版。学习此书以后,我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也发生了兴趣。我觉得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货币思想内容丰富,且有典型意义,反映的是中国关于货币本质论的两个派别——金属主义和名目主义的尖锐对立。为了正确评价这两派的货币理论,我认真阅读了一些货币理论著作,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用功尤深。我不以《资料选辑》中已选的资料为满足,进一步搜集史料,有不少新的发现。在此基础上,我写成了《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约8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

同时,我还对中国货币史问题作了一些研究,曾在1963年2月5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长文《大骗局 大掠夺 大灾难》,揭露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及其后果。论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反响,如读者张方仁先生通过《解放日报》赠给我一本他所著的《金融漫记》,1963年2月12日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署名文龙的《钞票贴在挽联上》作为对拙文的呼应。

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我着手搜集解放前出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了解本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情况。1962年和1963年,胡寄窗教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册相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最新成果,我认真进行了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也产生一些不同看法,投稿《学术月刊》同胡先生商榷,发表后胡先生亦为文辩驳。

在古代文献中,《管子》的经济思想特别丰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我决定先从《管子》下手。参考郭沫若先生等著的《管子集校》,在本系教师李民立先生的参与下,我们在1964年完成了一部《〈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书稿(书稿已交出版社,后因形势变化而未出版)。同时,我对其中颇具个人研究心得的关于对《管子·轻重》的论述还写成了专文《论〈管子·轻重〉》,在《经济研究》1965

年第1期发表。

《管子·轻重》是《管子》书中的最后一组文字，共19篇，现存16篇，主要以国家干预市场和商品流通为议论内容。西晋的傅玄曾说过“《轻重》篇尤鄙俗”的话，但近代以来的《管子·轻重》研究者一般都对它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它主张以国家调节商品流通、平衡物价为目标。我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的实质性的主张是要由国家控制市场，人为地造成物价的剧烈波动，从中获取厚利，反映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商业资本和国家高利贷资本的活动规律。论文发表后，得到了《管子》研究专家马非百先生的认同。多年以后，他和我建立了通信联系，在信中对拙文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拙文“是从(唐)尹知章(《管子》的最早注释者)以来最懂得书中内容的第一篇”(1976年4月8日来信)；又说他在这篇文章的启发下，在自己的《管子轻重篇新论》(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增加了“关于管子轻重之理论的体系”一节(1980年5月20日来信)。

1964年开始了“四清”运动。10月，我随上海财经学院的部分师生到上海市金山县参加“四清”运动。八个月后又参加上海市南汇县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尚未完全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74年4月上海财经学院又被撤销，大部分教师并入复旦大学。这样，我又回到了母校，在政治经济学系(现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任教。

在复旦执教后，我先是开中国经济史课，后来改开中国经济思想史课，并着手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材。首先编的是先秦部分。我认为编教材不能抄现成的观点，应以自己的研究为基础开展新的论述。通过研究历史文献，的确有新的发现。如照历来的说法，战国时产生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观点，只有唐庆增教授在

193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提出《管子》书中的“末”不是指一般工商业。我则进一步发现不仅是《管子》,《商君书》和《荀子》中的“末”也不是指一般工商业,而是指奢侈品生产。这三本书中都提到“禁末”,都不是要禁止工商业。韩非开始将“末”的概念扩大到一般工商业,以工商为末到西汉才成为流行观点。关于《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在我发表于1965年的《论〈管子·轻重〉》中还认为是产生于战国时期,这次通过对战国时期古籍的综合考虑,已转而确信产生于西汉说。所以我在先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只谈《管子》中属于战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包括《管子·轻重》和《管子·侈靡》中的经济思想(以《侈靡》篇产生时期的看法后来有变化)。书稿写好后,又以它为基础,同上海重型机械制造公司的工人写作组合作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秦部分,对原书稿有所补充和修改。稿子完成时,已是粉碎“四人帮”的日子了。“文革”结束后再恢复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我仍留在复旦。

粉碎“四人帮”后,教学和科研逐步恢复正常。我再一次对先秦稿子作了修改,定名为《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作者署名为“编写组”,以陈绍闻、叶世昌为主编。由于“文革”中“左”的影响不易一下子清除,书中还存在一些“评法批儒”的影子。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对书中的有些不妥提法,在重印时作过一次修改。

接着是写《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下册。因教学急需,先写下册。下册是近代部分,以1919年为下限(当时已学习过赵靖、易梦虹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至1966年出版,也以1919年为下限)。我在撰写《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时,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思想资料已多有接触,可以说是为编写《简史》下册作了相当的准备,故写起来比较顺利。

写成后,请陈绍闻教授审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

《简史》中册是秦汉以后的古代部分。《管子·轻重》的经济思想放在中册,内容是1965年发表的《论〈管子·轻重〉》的延续和发展。当时,明中叶后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是主流观点,我也相信,但我不认为明清之际的有些思想家已是市民阶级的代表,仍将他们定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如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王夫之的“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都不是市民阶级观点的表现。我对这些话的含义作了不同于流行观点的解释,现在看来仍是正确的。中册也请陈绍闻教授审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三册共约64万字。相对于上册而言,中、下册已经不算“简”了。这部书出版后被不少高校用作教材或参考书,曾多次重印。本书获得了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

三、重新解读中国金融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意重印已故彭信威教授的1965年版《中国货币史》,但认为书中有史实错误,对史料的运用解释也存在一些问题,另外还需补充1965年以后的新的研究成果,于1978年7月派两位编辑到学校来找我,邀我对此书作些必要的修订。我因忙于写《中国经济思想简史》,曾再三推辞,最后因兴趣所在,还是接受了邀请。这样我又重新进入了中国货币史的研究领域。我在上海图书馆胡群耘女士的协助下,对书中所引的史料进行逐条核对,发现了不少引用史料或排印的错误。到1981年,终于完成了对《中国货币史》的增订工作。但因涉及已故作者的著作权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最后仍放弃了该书出版增订本的打算。

《中国货币史》增订版没有出版,对此我并不在意。因为通过大量查阅资料,我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学力大有增进,这为自己研究中国货币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劳动并没有完全白费。我还想到,在学术观点上见仁见智在所难免,改动原作者的观点很可能招来非议,不出版此书稿对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反而感到庆幸。不过,对于确凿的史料或印刷错误,后来我写了一篇《对〈中国货币史〉的若干订正》,发表于《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

1980年我被评定为副教授。1982年接友人周成启来信,约我参加贵州省金融学会、贵州省金融研究所组编《中国货币理论史》一书的编写,我欣然接受。但实际上贵州省金融学会并无这方面的研究者,也无这方面的资料积累。故先由我写出《中国货币理论史》的古代部分,经贵州省金融学会组织专家讨论并经我修改后作为上册,由中国金融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

1985年我被评定为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导师,于次年始招收博士生。当时有些学者注意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我申请到国家教委“七五”研究规划课题《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此书由我主编,按专题分述中国古代有关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约28万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接着又受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主编了一部《十大理财家》,作为《“十大”系列丛刊》之一。此书主要由博士生和硕士生分工撰写,我只是作了策划和修改工作,并写了一个简短的《前言》。编成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从这一年开始,我获得了政府特殊津贴。

当时最主要的研究和撰写任务还是要完成《中国货币理论史》的下册,即近代部分(以1949年为下限)。它于1990年列入国家教委第三批博士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下册的时间跨度只有109